

# 中国各地区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分析

徐少君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在构建我国各地区金融排除相对指数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各地区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就业水平、交通条件、执法效率、社会资本等对金融排除有显著负作用;而立法程度却未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在既有金融改革背景下,除了继续完善法律制度、强化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地区人均收入、提高执法效率、营造良好的社会资本环境,从而降低金融排除程度,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金融排除; 金融沙漠;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 0 引言

2008 年 1 月 17 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在北京发表了《全民金融:拓宽渠道的政策与陷阱》报告,建议中国拓展金融服务的渠道,提高对穷人和相应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由此可见,对我国金融排除的关注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我国 1998 年开始实施了部分金融分支机构的撤并改革。诚然,该改革是商业银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也是提高商业银行效率、参与激烈竞争的重要途径,其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次改革通过直接撤并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金融分支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区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因此,我国具有研究金融排除的现实背景。作为社会排除的一个重要子集,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不仅会导致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同时,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因此,积极开展对我国金融排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金融排除的涵义,目前研究并没给出一致

界定。但纵观文献,概括而言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从广义视角进行定义,认为金融排除就是阻碍贫困群体、贫穷地区充分接触金融系统这一过程;其二是从狭义视角进行定义,认为金融排除就是缺乏拥有某一特定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但无论哪一视角,公平、平等地接触金融产品是其潜在的假设<sup>[1]</sup>。笔者借鉴广义含义,认为金融排除主要是指某一人群、某一地区未能充分接触到正规金融产品或服务。

纵观国外金融排除的研究,可将其分为两阶段:早期研究关注于接近金融服务和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性问题<sup>[2]</sup>,如从银行分支的关闭等角度分析了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空间所产生的影响<sup>[3]</sup>。该时期的研究主要运用地理学分析方法对美国<sup>[4]</sup>、英国<sup>[5]</sup>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排除进行空间分析,发现金融排除具有明显的地理倾向,低收入地区银行分支机构的关闭率是相当高的。后期研究开始向文化与制度转向——关注于更复杂的金融排除过程以及谁会被排除、为什么等问题的研究,更注重对微观个体的调研分析<sup>[6]</sup>。尽管各文献运用不同的国家(地区)样本、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统计方法对金融排除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结果;但是,总

体而言,收入等因素对微观个体的金融排除有重要影响<sup>[7]</sup>。尽管在国外,金融排除已经引起了学者、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的高度关注;然而,目前国内对中国金融排除问题的深入研究还较少,主要集中于综述(如徐少君和金雪军<sup>[8]</sup>)、国外经验借鉴(如王志军<sup>[9]</sup>)等方面;而对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等研究还相对较少,如徐少君和金雪军<sup>[10]</sup>用微观个人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因此,笔者突破传统影响因素研究的“微观个人”视角,从区域角度对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目前对于金融排除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国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研究还较少,而显然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排除问题更严重。同时,如前文所述,我国也具有研究金融排除的现实背景。因此,深入地对我国金融排除影响因素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扩展金融排除研究样本。二,从研究范围看,既有文献主要基于微观个体层面<sup>[10]</sup>,但对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分析则较少。鉴于我国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从地区(省际)层面对金融排除进行研究,有助于扩展金融排除研究层面。所以,本研究一方面希望能丰富金融排除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促进中国金融排除的研究,从而为制定相关降低金融排除程度的政策提供一定参考,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1 变量指标与计量模型的选择

1.1 各地区金融排除相对指标的构建

从含义上而言,金融排除关注“金融服务的未接触性或不完全使用”,这正好与 Beck 等提出的“金融宽度”<sup>[11]</sup>构成反意。所谓金融宽度,主要指金融服务的可接触性或使用程度。因此,鉴于金融排除直接测度的困难性,笔者在借鉴了 Beck 等关于“金融

宽度”的衡量思路基础上,采用“差值法”反向构建金融排除相对指数。

与祝英丽等<sup>[12]</sup>研究不同,本研究突破传统的“银行信贷”衡量视角,尝试从“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三个维度对三类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储蓄、贷款、基本保险服务对金融排除进行相对全面的衡量。其中,“地理渗透性”反映了人们接触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可达性,“使用效用性”是指人们对金融服务的具体使用数量,“产品接触性”主要是指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人数比例。表 1 显示了金融排除指标体系的构成因素。根据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1993~2006 年的数据,可得到“31 个地区×22 个指标×14 年”三维指标。此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能克服传统主成分分析法所存在的“不同数据表属于完全不同的主超平面、从而无法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问题,得到金融宽度的综合指数  $\{x_i\}$ 。

根据金融排除与金融宽度之间的“反向性”,采取“差值法”对指标进行转换。首先对  $\{x_i\}$  序列进行极差标准化,得到  $\{x_i' = \frac{x_i - x_{\min}}{x_{\max} - x_{\min}}\}$  序列,然后,各地区金融排除相对指标可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exclu_i = (1 - x_i') \times 100\%$ 。进一步,可将  $\{exclu_i\}$  序列重新排列,形成  $\{exclu_{it}\}$  序列 ( $i = 1, 2, \dots, 31; t = 1, 2, \dots, 14$ )。

为进一步显示三大地区的金融排除差异,表 2 对东、中、西三大地区 1993~2006 年的金融排除平均情况进行了统计。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金融排除程度要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均值角度看并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因此,东部地区基本上处于金融排除的低程度水平上,而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处于金融排除的高程度水平上。

表 1 我国各地区金融排除的指标体系构成

对象	衡量指标	计算方法
A 地理渗透性		
A,B	人口维度的银行机构渗透性	银行机构数量/地区人数(万人)
	地理维度的银行机构渗透性	银行机构数量/区域面积(万平方公里)
C	人口维度的保险机构渗透性	保险机构数量/地区人数(万人)
	地理维度的保险机构渗透性	保险机构数量/区域面积(万平方公里)
B 使用效用性		
A	人均储蓄存款量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地区人数,人均储蓄存款额/人均 GDP
	人均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地区人数,人均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人均 GDP
B	人均贷款量	消费信贷额/地区人数,私营个体贷款/地区人数,农业贷款/地区人数;人均消费信贷额/人均 GDP,人均私营个体贷款额/人均 GDP,人均农业贷款额/人均 GDP
	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区人数;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人均 GDP

表 1 续

对象	衡量指标	计算方法
C	人均参保量	基本社保基金收入/地区人数,人均参保量/人均 GDP
	人均保费收入	保险密度,保险深度(%)
		C 产品接触性
A,B	享受服务的人数比	用收入分布预算法计算得到
C	享受基本保险服务的人数比	(医保+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地区人数

注:A 表示储蓄服务,B 表示信贷服务,C 表示基本保险服务。数据时间段为 1993~2006 年。银行机构、保险机构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保险年鉴》(银行机构数量主要是正规金融机构的统计口径,包括总行、分行以及各分支机构),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于各地区《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各地区金融报告。其中,收入分布预算法借鉴 Beck 等<sup>[11]</sup>的方法进行推算。

表 2 三大地区金融排除相对指数的均值比较

地区	<i>exclu</i>	地区	<i>exclu</i>	地区	<i>exclu</i>
北京	43.00	山西	84.09	重庆	82.51
天津	63.67	内蒙古	88.45	四川	88.80
河北	86.63	吉林	82.71	贵州	92.64
辽宁	77.47	黑龙江	84.76	云南	89.85
上海	40.66	安徽	90.56	西藏	87.39
江苏	79.16	江西	89.45	陕西	84.98
浙江	72.67	河南	89.77	甘肃	88.40
福建	84.74	湖北	88.11	青海	87.55
山东	83.48	湖南	91.17	宁夏	84.78
广东	69.64			新疆	84.25
广西	91.19				
海南	84.00				
东部地区	73.03	中部地区	87.67	西部地区	87.11

注:*exclu* 表示各地区 1993~2006 年金融排除指数的均值,东、中、西部地区的 *exclu* 则表示对东部地区 12 个省(市)、中部地区 9 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 10 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排除指数的均值。

1.2 金融排除影响因素与计量模型

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a)收入等个体特征变量。收入(*lninco*)和就业状态(*empl*)对金融排除有显著作用<sup>[7]</sup>,尤其是收入因素更被认为是影响金融排除的最重要因素。笔者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地区从业人数占比分别表示 *lninco*、*empl*。同时,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程度的金融排除,因此,设置民族变量(*mino*),将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这 5 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设为 1,其余地区为 0。此外,尽管性别、年龄等的作用有所争议,但相对而言,男性由于具有相对较高的收入因而被排除的概率较低,儿童和老年人由于收入、传统等原因也具有相对较高的金融排除概率,因此,笔者以各地区男/女比例、0~14 岁和 65 岁以上的人数占比分别表示各地区男性人数比重(*man*)、儿童人数占比(*age0*)、老年

人人占比(*age65*)。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地区(1994~2007 年)《统计年鉴》。

b)接触便利性变量。尽管从区域层面看,平均到银行的距离将是一个很好的直接衡量指标,但较难获取;而作为接触距离的一种反映——交通条件,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人们接触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便利度。因此,笔者采用“每百人民用汽车拥有量”反映该地区交通的便利性(*tran*)。相关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 年)。

c)法律制度变量。自从 LLSV 将法律制度和法律执法效率引入到对金融的研究后<sup>[13]</sup>,大量的法与金融研究结果显示,法律起源、法律执行的效率对一国金融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并且相对而言,法律执行的质量比法律条文更能对金融发展发挥作用。随着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权利保护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可降低银行对特定群体、特定地区的“惜贷”程度,从而降低金融排除程度。同时,如 Boulton 等所强调的执法重要性<sup>[14]</sup>,一定程度上,高效的法律执行力将有助于监督债务人减少违约概率,提高归还可能性,从而提高整个金融服务运行的效率和效果。由于缺乏直接衡量我国法律对投资者债权人保护程度和执法效率的数据指标,笔者借鉴笔者和金雪军先前提出的方法<sup>[15]</sup>,用我国 1993~2006 年法律保护程度指标(*law0*),年检察院的结案数/接受案件数(*law1*)、年法院执行案件数/人口总数(*law2*)以及年处罚金额/总筹资额”(*punish1*)表征执法效率。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法律年鉴》和 Wind 数据库。

d)社会环境变量。自从 Putnam 首次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后<sup>[16]</sup>,许多学者发现,当法律环境比较弱时,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力更强<sup>[17]</sup>。作为一种非正规的治理机制,较高的社会资本程度有利于促成协调和合作,减少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行为,降低交易费用;同时,作

为一种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内在地影响着行为人的道德规范,制约着行为人的行事规则。既然金融服务作为一种不确定性较高的行为,其本身就是一项高信用度集聚的契约,在法律环境比较弱的条件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在的制约因素,会潜在地影响金融排除的程度。关于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笔者采用了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研究时普遍引用的张维迎等<sup>[18]</sup>关于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信任度(*social*)指标进行替代研究。

e)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将会间接影响到该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到金融排除的程度,因此,笔者以各地区实际 GDP 的增长率(*grow*)进行表征。同时,银行存贷利差(*spre*)反映了人们享受金融服务的直接成本,对金融排除也有重要影响,因此,笔者用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

f)其他变量。为了反映地区差异,笔者用地区虚拟变量 *east*、*mid* 分别表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来控制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同时,为反映 1998 年金融分支机构改革对金融排除的影响,笔者引入年份虚拟变量(*year*),1998 年及以后设为 1,其余为 0。

基于此,考虑了多重共线性后,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

$$exclu_{it} =$$
$$\alpha_i + \beta_1 lninco_{it} + \beta_2 empl_{it} + \beta_3 mino_{it} + \beta_4 man_{it} +$$
$$\beta_5 age0_{it} + \beta_6 age65_{it} + \beta_7 tran_{it} + \beta_8 social_{it} +$$
$$\beta_9 law0_{it} + \beta_{10} law1_{it} + \beta_{11} law2_{it} + \beta_{12} punish1_{it} +$$
$$\beta_{13} grow_{it} + \beta_{14} spread_{it} + \beta_{15} east_{it} + \alpha_{16} mid_{it} +$$
$$\alpha_{17} year_{it} + \varepsilon_{it}$$

(1)

## 2 实证结果

表 3 显示了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应主要采用 FE 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变量中,各地区人均收入(*lninco*)在 1%水平上对金融排除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金融排除程度越低,稳健地支持了文献中所提到的“金融排除是收入的一个负函数”论题。其实,收入对金融排除的影响也可能通过银行分支机构的多少反映出来,收入越低,往往银行分支机构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对金融排除程度有显著的负作用。同时,就业率(*empl*)作为影响个人(或家庭)雇佣状态的一个显性体现,对金融排除也有着显著的负影响;换句话说,失业率越高,金融排除的可能性就越大。然

而,性别、年龄、民族等特征并不是影响金融排除的显著因素,这与 Devlin 得到的结论<sup>[7]</sup>一致。

表 3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因素	(1)FE 模型	( <i>t</i> 统计值)	(2)RE 模型	( <i>z</i> 统计值)
<i>lninco</i>	−5.20***	(−3.71)	−6.03***	(−4.31)
<i>empl</i>	−5.10***	(−3.71)	−4.48***	(−3.22)
<i>man</i>	−0.50	(−0.04)	−3.26	(−0.24)
<i>age0</i>	7.79	(1.13)	11.32*	(1.66)
<i>age65</i>	6.69	(1.44)	5.29	(1.11)
<i>mino</i>			2.96	(1.50)
<i>tran</i>	−7.48***	(−28.19)	−6.93***	(−27.25)
<i>social</i>			−0.05***	(−3.48)
<i>law0</i>	0.01	(0.89)	0.01	(0.92)
<i>law1</i>	−3.87	(−0.87)	−2.71	(−0.61)
<i>law2</i>	6.07	(1.06)	7.80	(1.34)
<i>punish1</i>	−4.24***	(−2.64)	−4.03**	(−2.44)
<i>grow</i>	12.86***	(4.25)	12.04***	(3.86)
<i>spread</i>	0.51**	(2.03)	0.46**	(1.79)
<i>east</i>			−0.10**	(−2.05)
<i>mid</i>			0.62	(0.30)
<i>year</i>	−1.38	(−0.41)	−1.55	(−0.95)
<i>c</i>	122.34***	(9.29)	132.49***	(10.29)
<i>F</i>	241***	0.00		
$\chi^2$			3210***	0.00
hausman	122***	0.00		

注:以 *exclu* 为因变量进行 OLS 回归。对于模型(1)和(2)的 FE、RE 选择,hausman 检验显示应该选择 FE 模型。表格下方分别为 *F* 统计值、卡方统计值、hausman 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以及对应的 *P* 值。\*\*\*、\*\*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接触便利性指标(*tran*)对金融排除有显著的负影响,意味着交通条件等接触便利性程度的提高,导致了金融排除程度的降低。

法律制度变量中,作为执法效率的衡量指标 *punish1*,表现出了显著的负作用,也就是说,随着执法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从制度上减少违约概率,从而提高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意愿,使得金融排除程度相应降低。然而,立法程度(*law0*)对金融排除却没有显著作用,印证了许多学者提出的“执法比立法更重要”这一论点。

由于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social*)为一横截面数据,因此,未在 FE 模型结果中体现出来;然而,根据其在 RE 模型中的结果,其对金融排除有显著的负作用,即社会资本程度越高,金融排除程度越低。

宏观经济变量中,经济增长速度(*grow*)、存贷利差(*spread*)则对金融排除有显著的正影响,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利差越大,则金融排除的程度也越

高。这一方面显示出,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全民收入的普遍提高,而是以差距化发展为代价的,因此导致了经济增速越快,金融排除程度反而越高。这其实与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是相吻合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差,因而其发展速度要高于东部地区。同时,利差越大,显示了利用金融服务的成本越高,因此便导致了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

此外,相比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east*)具有显著较低的金融排除程度,这与表2的结果一致。同时,年度虚拟变量 *year* 也并不显著,表明我国金融分支机构改革虽然与金融排除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38),但其并不是造成金融排除程度提高的直接显著原因。

### 3 总结及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我国各地区金融排除的相对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我国金融排除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a)地区人均收入、就业水平对金融排除有显著的负作用。因此,要减轻金融排除程度,需要从本质上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就业率。

b)地区交通通讯的便利性能显著降低金融排除程度,所以,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硬”环境。

c)执法效率、社会资本等因素构成了影响金融排除的“软”环境,对金融排除程度的降低有显著作用;然而立法程度却没有显示类似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支持了 Boulton 等关于“执法比立法更重要”<sup>[14]</sup>、以及 Allen 等关于“非正规治理机制在法律环境较弱情况下所发挥出来的更为重要作用”<sup>[19]</sup>的观点。因此,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不断提高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更要注重执法效率的提高,引导金融市场的规范运作;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和营造良好的社会资本环境,创造良性循环的金融运行环境,从而降低金融排除程度。

d)地区经济发展可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因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金融排除程度的降低。然而,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已有大量研究论证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收敛性),于是体现出了经济增速与金融排除间的正相关性。这从某种角度上也反映出各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所引发的金融发展差异

等问题,表现出较强的金融排除地区差异性,相对而言,东部地区金融排除程度显著较低。因此,需要关注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排除程度,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从而直接或间接降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排除程度,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e)尽管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本次金融机构分支改革的确与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有密切关系,然而,其并不是直接引起金融排除程度提高的显著原因,而是其他嵌于地区的特征变量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因此,在目前既定的分支机构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也需要强调“社会责任”,发挥一定的“金融扶持”功能,促进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各社会基金、社区等多种力量也要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引导基金、激励计划、援助等多种形式,降低地区金融排除程度。

### 参考文献:

- [1] ANZ. A report on financial exclusion in Australia[R]. Chant Link & Associates, 2004.
- [2] Leyshon A, Thrift N.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ithdrawal: problems and policies[J]. *Area*, 1994(26): 268-275.
- [3] Leyshon A. Geographies of money and finance II[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7, 21(3): 381-392.
- [4] Pollard J S. Banking at the margins: a geograph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los angel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6, 28(7): 1209-1232.
- [5] Fuller D. Credit union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J]. *Geoforum*, 1998, 29(2):145- 157.
- [6] Kempson E, Whyley C. Kept Out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M].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1999.
- [7] Devlin J F. A detailed stud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UK[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05, 28: 75-108.
- [8] 徐少君, 金雪军. 国外金融排除研究新进展[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8(9): 86-91.
- [9] 王志军. 金融排斥:英国的经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2): 64-69.
- [10] 徐少君, 金雪军. 农户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6): 62-72.
- [11] Beck T, Demirguc-Kunt A, Peria M S M.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5(91): 234-266.
- [12] 祝英丽, 刘贯华, 李小建. 中部地区金融排斥的衡量及原因探悉[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2): 70-74.
- [13]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Law and finance [J]. Journal of Politic Economy, 1998, 106: 1113-1155.

[14] Boulton T J, Smart S B, Zutter C J. IPO underpricing and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2):206-222.

[15] 徐少君, 金雪军. 社会资本, 法律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和 IPO 抑价[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8(1): 1-31.

[16]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526-557.

[18]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

[19] 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57-116.

#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China: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y

XU Shao-ju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relative financial exclusion inde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o financial exclusion by panel data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per capita, employment level, efficiency of enforcing law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e reg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nancial exclusion, while law development does not have this effect. So we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perfect the law institu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 but also increase income per capita, enhance efficiency of enforcing law and build good environment of social capita of the region,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advance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s.

**Key words:**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desertification; influential factors

(责任编辑: 马春晓)